

超越与回归

——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何显明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超越与回归

——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何显明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与回归：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 何显明著. —2
版.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486-0770-0

I. ①超… II. ①何… III. ①毛泽东思想研究 IV.
①A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6143 号

超越与回归

——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作 者——何显明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网址：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www.ewen.co

印 刷——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22

字 数——28.5 万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2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770-0/A·2

定 价——58.00 元

再版说明

《超越与回归——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初版至今,已过去了十二年。此次再版,是基于以下的考虑。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专著,可谓汗牛充栋,本书只是其中的一种,既非开创之作,亦非压卷之作,但本书数万册早已售罄,说明本书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本书从本土文化在社会巨变中,以及对毛泽东本人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的角度进行研究,是本书的最大特色。作者引证了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大量论述与其在革命历程中形成的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所突出的主题——超越与回归,依然是值得人们继续思索的。

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统治意识与20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似乎是绝缘的,但本书突出了传统的本土文化始终存在,其中的传统理想社会思想仍然有着相应的社会作用。对本土文化的重视与反思,是本书的又一大特色,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

诗化的毛泽东人格魅力,是学术研究中容易忽视和弱化的一个方面。本书能在学术研究中重视并强化这一点,不仅增强了可读性,也使其研究得以深化。

随着时代的推移,新一代读者不断产生,向他们推介好书,是出版社应尽的社会责任。可以预期,本书将继续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再 版 前 言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现的那场“毛泽东热”现象,以及近些年来围绕毛泽东评价引起的激烈纷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深刻启示就是,无论今天社会各群体以何种心境、何种态度看待毛泽东,毛泽东都是中国转型发展无法回避的重大的现实存在,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遗产还将以各种不同方式对现实生活,乃至未来的发展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90 年代披露毛泽东个人生活情趣和七情六欲的纪实文学引起轰动效应,沉寂了几十年的“红太阳颂”一度成为最时髦的流行歌曲,这些现象充分表明,无意于,也不可能过多、过细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社会大众,对毛泽东个人的超凡魅力、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求索的欲望。然而,由于这场“毛泽东热”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其中夹带的非理性成分,被商业化运作的许多出版物进一步放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场“毛泽东热”中,充斥在各种出版物中的是对毛泽东个人神奇魅力过分夸张的渲染,是对奇理斯玛领袖人物非理性的留恋与期待。显然,对毛泽东的兴趣,以及人们所表达的价值、情感诉求,更多反映的是人们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复杂感受。就像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文化的多元化,同样使今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了对毛泽东这一历史人物纷繁复杂的情感表达。遗憾的是,近年来颂毛与非毛的两极化对立,流露出来依然是主观构建或各自想象

的毛泽东,或者非历史地美化、神化其成就,甚至用后现代话语包装其思想主旨,重新将其塑造成拯救时弊的希望,抬上教主的神坛,或者同样非历史地将其贬斥为今天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在情绪的表达和宣泄中,唯独缺少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及其所作所为的历史与文化根源的理性反思。结果,除了满足一部分人一时的情感需要以外,相关的纷争对于民族理性的觉醒并无多大裨益可言。

有鉴于 90 年代“毛泽东热”中出现的对毛泽东人格的精神膜拜现象,以及毛泽东的文化心态研究被长期忽视的状况,本书立足于对毛泽东人格世界及其文化根源的剖析,力求全面、客观地把握毛泽东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并对“毛泽东现象”作出理性的反思。我们认为,毛泽东的人格是中西方文化冲突、交融的产物,毛泽东的文化心路历程是近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历程的人格投影。它以个人“小我”的形式,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民族“大我”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历史大背景中摆脱传统束缚走向新生的精神悲喜剧。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人格世界和文化心态是我们今天反思民族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窗口。

中西交融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根基,为毛泽东走上历史舞台,并给现代中国烙下深刻的个人烙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种文化背景和近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塑造出了毛泽东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互交融的文化性格,塑造出了毛泽东同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心理期待极为合拍的人格魅力。与此同时,长期沐浴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氛围之中,也不可避免地给毛泽东的文化心态带来了某些消极的影响。毛泽东以传统文化的叛逆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的,但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又使晚年毛泽东在执着地超越传统文化之际,恰恰又在相当程度上重新复归于传统的怀抱。

从文化学的视野,特别是从中西文化冲突、融会的广阔背景中去透视毛泽东个人思想理论的精神特色、文化渊源,及其在

中国思想文化史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改革开放之后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热点。这种研究视野和方法的转换,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曾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但是,严格地讲,对于毛泽东及整个“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学研究,国内学术界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甚至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也存在相当大的学术差距。在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相关的研究成果往往只局限于例证毛泽东对传统成语典故、神话故事、古代经典的引用;局限于说明毛泽东改造了几对传统哲学范畴。其实,这种文化承继仅仅是表层的。要真正深刻地认识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文化性格,它的传统文化精神根基,必须深入地探究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方式、审美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思想流派,包括诸子百家的思想,正统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反主流文化、士大夫的雅文化与民间的俗文化等如何积淀在毛泽东的人格世界和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进而如何从毛泽东毕生的思想和实践中透露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毛泽东现象”纳入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深刻地把握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内在精神联系,揭示出“毛泽东现象”所蕴含的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以往也容易受到一种固定模式的限制,即习惯于通过复述毛泽东有关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某些论断,来论证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所持有的辩证态度,而未能深入到毛泽东深层次的思想意识,他的人格世界和文化心态,从他个人的人格气质、价值理想、道德理念、审美情趣,以及他的喜怒哀乐中去分析他与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精神联系。这种研究模式一方面制约了学术研究的深化;另一方面又容易将毛泽东研究引入象牙之塔,难以对类似前些年出现的“毛泽东热”等现象作出积极的回应。

本书的写作,最初是应一家出版社的邀请,书稿完成于1993年初,后因某些原因未能付梓,辗转中竟搁置数年,并因此

使我退出了这一研究领域。经学林出版社的支持,本书于2002年出版,在学界和市场获得较好的反映,重印了几次,网上也有不少关注者肯定性的评论。

时间过得很快,今年又是逢三的年头。学林出版社提出了再版的设想。说实在的,我自己还真没有过这样的考虑,但注意到近些年围绕毛泽东评价呈现出来的种种纷争,我也就同意了再版的建议,尽管书中讨论的一些问题现在有了些新的想法。需要说明的是,自1993年之后,我基本没有再涉足这一领域,因而也就没有了合适的心境去做修订的工作,再版的书稿内容和文字并没有作过多的改动。敬请广大读者鉴谅。

何显明

2013年9月26日于杭州

目 录

再版前言	1
第一章 人间正道是沧桑	1
一、关怀与拯救	2
二、民本与民主	13
三、慈悲为怀,普渡众生	29
第二章 六亿神州尽舜尧	41
一、内圣之道	42
二、新民实践	49
三、圣贤气象	52
四、欲动天下当动天下之心	62
五、新人与新世界	70
六、马克思加秦始皇	77
第三章 刺破青天铄未残	84
一、传统中国的叛逆	84
二、“和尚打伞”	94
三、叛逆者的性格	97
四、造反有理	104
五、翻案与反潮流	111
六、传统与反传统	119
第四章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26
一、大气量人	126

二、远大目光·····	136
三、英雄使命·····	143
四、烈士风范·····	153
五、豪杰品性的精神本源·····	159
六、领袖魅力的社会效应·····	169
 第五章 踏遍青山人未老 ·····	 177
一、一代风骚·····	177
二、孤独的江海客·····	186
三、动·变·斗·····	191
四、诗化政治·····	203
 第六章 风景这边独好 ·····	 215
一、农家本色·····	215
二、价值的天平·····	221
三、实践理性·····	227
四、两难中的抉择·····	240
五、墨学流韵·····	253
 第七章 暮色苍茫看劲松 ·····	 266
一、万类霜天竞自由·····	267
二、“人有病，天知否？”·····	281
三、桃花源里可耕田？·····	285
四、从此天涯孤旅·····	297
五、上帝请我喝烧酒·····	309
 第八章 残阳如血 ·····	 317
一、英雄主义时代及其终结·····	319
二、毛泽东人格的象征意义·····	327
三、俱往矣·····	332

第一章 人间正道是沧桑

能否在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的复杂社会环境和悲喜无常的人生境地中，始终不渝地坚守某种终极性的价值理念，是评判一个人人生境界高低的一个重要依据。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种对终极性价值理念的坚守，正是其政治气节和操守的体现，是其区别于无廉耻的政客的根本所在。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中，这种终极性的价值理念即是所谓的“道”。“士志于道”，闻道、从道、守道、弘道，乃至殉道，是儒者的天职所在，是儒者社会价值的最高体现。这种价值理念反映到政治生活中，便是要求政治权力（势）的运作必须接受“道”的导引和规范。“道”体现的是一种合理的人间秩序，故在不同的人那里，“道”往往便有截然不同的内涵。于是，“道”有正邪之分，有王霸之别。尽管如此，在正统儒家那里，“道”总是与社会群体利益相关联。换句话说，合乎“道”所规定的人间秩序，必须合乎民心，顺乎民意。因而，历史的逻辑必然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价值理念上来讲，“天地间，惟理（道）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也，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在者也”^①。失

^① 吕坤：《呻吟语》卷一《谈道》。

“道”，最终必失“势”。然而，无情的历史事实却是，在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道”却一再遭到“势”的肆意践踏。为此，以守道为职志的志士仁人，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就不能不肩负起“以道易天下”的悲剧性的历史使命。“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与道殉乎人者也。”^①本着这样一种坚毅执着的理想主义信念，古代一些优秀知识分子高扬“民本”旗帜，同昏庸之“势”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演出了一幕幕令人肃然起敬的悲壮的历史活剧。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从道不从势，为坚守“民本”之道，不惜以身殉道的光荣传统。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毛泽东相当自觉地继承了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坚守民本之道的精神传统。无论作为一个无道之势的反抗者，还是作为热切探寻“人间正道”的执政者，贯穿毛泽东全部政治实践的一个核心政治理念，就是“民为邦本”，或者说“人民就是上帝”。始终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说话，始终以解除民众的苦难作为自己肩负的政治使命，构成了毛泽东价值情怀的核心。尽管晚年毛泽东在探寻“人间正道”的实践中也发生了种种失误，但就他在任何政治条件下，特别是在执政条件下，依然始终不渝地追寻和捍卫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的人间正道这一价值立场而言，他的确无愧为“士志于道”这一中国优秀文化精神传统卓越的实践者。

一、关怀与拯救

1920年9月，刚刚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毛泽东，受聘担任一师附小主事（校长）。破格聘用他的是当时的湖南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一师校长易培基。易氏对毛泽东的才学极为赏识，他对这位抱负不凡的青年人的前程作了最辉煌的描绘，时常对人说：“毛泽东将来要当平民天子。”^②

^① 《孟子·尽心上》。

^②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29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平民天子”的期许,是非常独特的。自古以来,“天子”就是“天子”,从来没有“平民”的“天子”。历代帝王充其量也不过是运用儒家“天心即民心”之类的理论,标榜自己的政治统治得到“天心”之垂顾,代表“民心”之所向,以此来粉饰其奴役万民的政治本质而已。但落实在毛泽东身上,“平民天子”的期待,又的确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所谓“平民天子”,对于毛泽东来说,其象征意义首先即在于它相当形象和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终其一生始终站在平民立场上,为平民的解放事业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的价值情感与立场。这种价值情感和立场,自然与儒家的文化传统有着很深的内在关联。

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的思想性格洋溢着鲜明的人世精神。尽管孔子也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①的念头,历代儒家君子高蹈远举者亦比比皆是。但是,真正的儒者,他的眼光必定是投注于眼前的世俗世界的。面对“礼乐崩坏”、王道湮没、霸道横行的残酷现实,他们既不能像杨朱之流那样“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把对人生无常的忧患与焦虑完全转化为对肉体享乐和世俗利害的关注;更不会像庄子一样,彻底忘怀于世间的一切,以窒息对世俗世界的价值关怀来完成对生命意义的觉醒。儒家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原始人道主义古朴遗风,始终把儒者的个人命运、生命价值同世道的变更、人间苦难的拯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同情、怜悯不同社会阶层所遭受的各种苦难,并将拯救这种苦难视为儒者的天职。当道家将拯救苦难视为徒劳无益和极不明智的妄举,袖手冷眼作壁上观时,儒者却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毅力,演出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殉道悲剧。从孟子“拯民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襟;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责任感,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献身精神,“关怀——拯救”的价值情怀,构成了中

^① 《论语·公冶长》。

国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精神品格之一,孕育出了中国历史上代不乏人的无数社会良知和民族脊梁。

从小就对“穷人”、“饥民”的悲惨遭遇寄予无限同情的毛泽东,在韶山冲阅读抱打不平、劫富济贫的造反故事,阅读儒家经典以及时人所著的一些救亡小册时,心中就已朦胧地升腾起一种拯民救世的英雄主义冲动,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现实使命感。离开韶山后数年间对传统典籍刻苦、系统的研习,以及“以贤圣为祈向”的人生追求,进而又将毛泽东朦胧的拯救意识升华为鲜明、强烈的思想性格和价值情怀,并将他的拯救冲动纳入了儒家正统的思想轨道,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伟大的精神品性。

“关怀——拯救”意识在胸间的萦绕,从根本上铸定了毛泽东异常执着的“入世”精神品性。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自觉地将个人的生存价值同民族命运的改变和人民苦难的拯救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了一起。唯有尘世间功、德、言“三不朽”的浩浩功业,而不是乃父式的发家致富,抑或松风明月、闲云野鹤式的隐逸生活,才能真正满足他强烈的拯救冲动,才是他的人生志趣之所在。对于毛泽东来说,置身近现代中国这个充满了混乱、灾难、耻辱的历史舞台,“出世”的选择根本就是难以想象的。“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对国人颓唐厌世、抵抗力丧失殆尽的消极心态的猛烈抨击,激起了毛泽东强烈的共鸣:

吾人所第一痛心者,乃在抵抗力薄弱之贤人君子,其始也未尝无推倒一时之概,澄清天下之心,然一遇艰难,辄自沮丧:上者愤世自杀;次者厌世逃禅;又其次者,嫉俗隐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沉。此四者,皆吾民之硕德名流,而如此颓唐,驯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天地易位,而亡国贱奴根性薄弱,真乃铁案如山矣!^①

^① 陈独秀:《抵抗力》,《独秀文存》卷二。

青年毛泽东同陈独秀一样,热切期盼着知识分子和一切有德行、有知识、有地位的人,能以悲天悯人情怀,本着舍身忘我的精神,挺身而出,去实现拯民救亡的历史使命。1917年8月23日,在给黎锦熙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就以标准的儒家语言概括了他的拯救意愿: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①

“救小人”是君子“功、德、言”不朽业绩和价值意义的根本体现,“小人”得救之日,就是君子天职实践之时。毛泽东向往的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独享社会特权,高高在上的贵族派头,也不是厌世逃禅的现代隐士的洁身自好,而是小人借君子之“援手”而得救,整个社会不分君子小人,济济一堂,共跻圣域的大同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毛泽东的确相当完美地承继了儒家文化关怀民瘼、关怀民族命运的优秀传统,并义无反顾地将它付诸现实的政治实践。

“关怀——拯救”的价值情怀,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人生历程,是毛泽东文化心路历程中最具有恒定性的精神要素之一。无论是作为一个传统型的儒家君子理想的实践者(五四前夕),一个近代民主主义者(五四时期),还是作为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的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站在底层社会大众的立场上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9—90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说话,为解除民众的苦难而不懈奋斗,是他毕生矢志不渝的根本信念与人生准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并自觉地献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时,他对民众疾苦的关怀,就不再是昔日君子对小人那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同情,而是完全同受压迫的人民大众站在了一起,同他们结成同呼吸共患难的一体关系,这就使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得到了极大的升华。于是,他的价值关怀就毫无假仁假义、鄙夷加怜悯式的传统士大夫气味,也不再是出于正人君子为标榜自己的高风亮节而故作的态度,而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至性真情流露。拯救也不再是为了施展个人抱负的一种纯粹的英雄主义冲动,而是意味着全身心地投入民众的行列,与民众一道去谋求最终的解放。自此以后,任何人如果还要居高临下,以教训的口吻对人民大众以及他们所从事的斗争实践说三道四,都必然要激起毛泽东强烈的义愤。1922年11月25日至12月12日,毛泽东参与领导了长沙铅印工人的大罢工。就在罢工取得胜利,工人开始复工的第二天,长沙《大公报》总编发表了一篇评论,劝诫工人千万要注意基本的学问,以克服自身的各种弱点,否则就会受人驱策,被人当作试验主义的牺牲品。这种以工人的天然训导者身份自居,居高临下地指点民众的姿态,以及点拨训诫的口吻,引起了青年毛泽东极大的反感。他迅速在第二天发表了一篇辛辣的驳斥文章,对“长衣社会的先生们”不是以平等的立场、人格,真心诚意地同工人大众相沟通,而是动辄“拿出他们那大知识主义、大读书主义来教训人”的姿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毛泽东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强烈申明:“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以为我们的朋友,再不要开口就‘你们做工人的’‘缺欠常识’、‘不守秩序’、‘品类日杂’,‘我忠告你们工人’,‘助长工人嚣张习气’,应当要说:‘我们大家……’才好呵!先生你真个能诚恳的帮助我们,忠告我们吗?那么,我们很愿和你握手,请你赶快拿出你的手来,切莫再‘你们,你们’,恍惚象我们是‘官’你们是‘小的

该死’一样!”^①毛泽东这种对长衣先生们同工人民众相隔阂、疏离的冷漠态度的抨击,实际上无异于是对自己早年习得的传统的君子救小人观念的一次清算。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自身思想情感转变的经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日后一再特别强调,在人民解放事业中担负着重要使命的知识分子,“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②。他们首先必须完成一个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使自己“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③他们只有在思想情感上与人民大众形成强烈的共鸣,真正成为人民大众意愿的代言人以后,才能真正为人民所拥护,在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成就英雄的业绩。就毛泽东自身而言,他与民众息息相通的思想感情,始终是深切而由衷的。

毛泽东的性格无疑偏重于外向型,他从不习惯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嬉笑怒骂均形之于色。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老爷,那些享受社会特权的大人物,毛泽东的心肠是刚硬冷酷的,他往往没有什么好话留给他们,没有文质彬彬的雅致,也没有宽容的“雅量”。挖苦、嘲讽、抨击几乎是家常便饭。看到他们压抑小人物时那种专横跋扈的样子,他甚至会怒不可遏,破口大骂。但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黎民百姓,特别是那些受尽大人物凌辱的小人物们,毛泽东则总是表现出一副异常柔软的心肠,他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慈祥面容。他们为他们所遭受的各种苦难而悲伤落泪,夜不能寐。在对民众疾苦的价值关怀方面,毛泽东绝不会比已被广泛推崇为圣贤道德境界的现代人格象征的周恩来逊色分毫。

毛泽东欣赏敢于反抗,敢于不惜同束缚个性发展的一切网

① 毛泽东:《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大公报》(长沙) 1922年12月14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851—85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